

13.07

浦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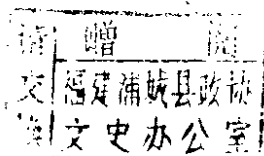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33

浦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吴邦彦同志传略·····	文史办 (1)
怀念吴邦彦同志·····	徐汉涛 (8)
我的爸爸·····	吴瑞申 (19)
忆邦彦同志晚年在浦二、三事·····	祝凌云 (29)
机智勇敢，坚贞不屈	
——周楚钦烈士斗争片断·····	徐建中 (33)
李葆珊先生及其“酌海楼”·····	占秉辑 (38)
四十年前的一桩旧事·····	黄石坚 (44)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傅延鹏采集整理 (49)
浦城林业发展概略·····	曾振邦 (61)
浦城金融业简介·····	吴映川 (92)
浦城工商税收今昔·····	伍常礼 (105)
浦城粮政记事·····	周 静 (114)
建国以来的浦城建筑业·····	余 成采集整理 (122)
国营汽运保修企业	
——浦城保养场简介·····	彭 龙 (131)

解放前浦城印刷业简况·····	祝振宏 (137)
浦城电影放映事业·····	程书裕 (142)
岩岭头的俞家拳·····	姜培兴口述
	余忠义 季良锷 陈侃如整理 (150)
建国以来浦城重要考古发现	
——浦城古代经济的几个侧面·····	赵鸿章 (155)
抗战期间我在浦城中学·····	陈郑煊 (163)
浦城县第一所县立女校·····	姚文琴 (168)
私立福建学院在浦城·····	朱 程 (177)
也谈浦城鼠疫·····	叶光明 (181)
我在榕城浦城会馆·····	房邦俊 (185)
浦城寺庙简介·····	周克恭 (189)
忆浦城六所会馆·····	陈景清 (194)
“国大代表”选举亲历记·····	季恭让 叶邦彦 (199)
浦城护国军起义述略·····	陈长河 (205)
杨亿诗歌浅探·····	邱文彬 (209)
补白五则	7 页、141页、149页、188页、193页
	·····蒋仁、胡邦豪 广播电视局等
封面设计、题字·····	姚吉生

吴邦彦传略

政协文史办公室

吴邦彦，字春光，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六日生于福建浦城，毕业于上海无线电训练所，毕生致力于电信事业，投身于人民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罢工运动。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科长兼副秘书长，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电报处、技术处、农村电话处等处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病逝。

邦彦从小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一九二〇年考入福建省立第五中学(在建瓯)，毕业后，回乡任教于县明伦堂小学，以积资升学深造。一九二七年考入上海无线电训练所，从此投身电信事业。在邦彦求学的年代，正是“五·四”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波及全国。他加入了爱国学生运动的行列，查禁日货，在运动中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

熏陶，使他较早地认识社会。一九二六年，他节译了英国大文豪迭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的第三卷第十章，题为《狱中悲影录》，译文的前言写道：“法国当时贵族之过于虐待平民……其与今日资产阶级之过于压迫无产者，同出一辙也！际兹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之秋，吾人研究革命，实可为攻错之助。”可见邦彦在求学的青年时代，就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

邦彦在上海无线电训练所学习结业，实习完毕后，于一九二八年七月投身于北伐军，担任过无线电报务员和白崇禧行营电台报务主任，旋又到福州组设民用电台，接着在上海外滩和刘行国际电台当报务员。在上海，邦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以“接受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分会，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马、恩著作和鲁迅、邹韬奋、高尔基等著作，亲自撰写文章，秘密主编《点划》（不定期刊物），抒发报务员心声，传播进步思想，揭露官僚资产阶级对电信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在《点划》被当局责令停刊后，1936年5月21日他以“春光”为笔名，撰写《报务员在中国》，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电业事业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报务员经受疾病折磨，克扣工资，增加工时，裁减撤调，逼讨房租等等压迫剥削之苦。这篇文章被茅盾编入《中国的一日》一书中，对当时电信界影响很大。同时，还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发

动组织“报务员进益会”(即工会),团结进步青年,发动微薪罢工运动。在刘行国际电台,邦彦深受青年同事的崇敬,大家都觉得他学识渊博、洞察力强、预见性强,见解独特。当年刘行国际电讯台同事、现任北京人大驻会常委徐汉涛回忆:那时,邦彦同志借给他许多进步书刊,如《塞上行》、《茅盾小说选》、《阿Q正传》、《庶(苏)联印象记》、《大众哲学》、《新哲学人生观》等等。他读了这些书,曾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这些书给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好象井底蛙跳出了井圈,……世界竟有这样的大,天下事竟有这样的复杂!”并在他怀念文中肯定地说:“启发引导我接近进步的就是他(指邦彦)。”

“八·一三”事变后,刘行国际台被炸。一九三八年二月,邦彦转到内地,先后在武昌、昆明担任国际电讯台值机报务员和云南省电信管理局业务处长。在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武汉,他与抗日救国会的沙千里取得联系,并加入了卢文懋组织的“武汉电信界抗敌服务团”,接任主编邱关瑾创办的《电信界》月刊,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广大职工,坚持抗战。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吕福田回忆说:“这份刊物在当时电信界是全国性的(我指的是蒋管区)三坚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刊物,在政治号

召上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一九四四年在昆明，邦彦化名孟心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组织部工作，追随李公朴、闻一多、周新民等知名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统一，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立即撕毁协定，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在这种形势下，邦彦同志和昆明市地下党取得联系，一九四六年二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先后在昆明、武汉、南京等地，以电信管理局业务处长等职务为掩护，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在武汉为党传递秘密信件给曾淳、陈克冬、李循棠等，并为民盟组织起鄂总支，指导武汉大学学潮。在南京，他担任中共电信支书，与汪光之共同组织了二十多人的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并且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季焕麟。一九四八年冬，重返昆明，任第五区电信管理局业务处长时，参加中共昆明市委，负责统战工作，还兼任民盟滇总支主委。与缪文兴一道，秘密抄转新华社消息，并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筹运医疗器械药品。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邦彦与郭佩珊、李剑秋等三人，组成“三人统战小组”，邦彦任组长，由中共云南省委直接领导，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并积极策动云南和平解

放，为党的统一战线和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云南和平解放后，邦彦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党派科及民族科科长兼副秘书长。一九五一年四月，调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先后担任电报处处长，技术处处长，农村电话处处长，从事他的专业，发挥他的业务专长。在任十多年，他努力钻研业务，认真掌握全国各地电信工作情况，深入到东北、中南各省的基层单位考察，调查研究，广泛征集电情职工意见，务使我国电信事业的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工作颇有成效。

邦彦一身从事电信以及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等工作，广交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党内外同志，又酷爱读书写作，发表诗文颇多。一九六〇年，他将与友人唱和诗词集为《嘤鸣集》交付出版社。出版社将诗稿转送邮电部审查，审查人发现诗稿中有一首关于吃饭排长队的诗，就无限上纲，说是讽刺社会主义，反对党，甚至说他是“第三国际的间谍”，最后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出党，工资降三级，并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下放到故乡——浦城，在县邮电局发售邮票。一九六六年，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邦彦更受冲击，屡遭批斗。一九六九年，被下放到县邮电局办的“五·七”农场看番薯地。处在这种逆境中的邦彦，始终认

为自己是无辜的，相信问题总有一天能得到正确处置。他心胸开朗，说“问题解决了，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二十年”。他卖邮票时，人民群众称赞他是邮电局里服务态度最好的人。他生活有规律，每天早晨做广播操，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和马恩著作，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常唱《国际歌》以抒情怀。他七十诞辰时诗中写道“战士病休忘荣辱，晚宗马列愿身殉”。他心里记挂着我国的电信事业，煞费苦心地对当时我国邮电事业管理体制沿袭苏联的弊端，提出适合国情的改革建议，交当时浦城县邮电局的军代表，请求转呈周总理。

处于逆境中的邦彦，却很关心群众，乐于助人。他自己生活很艰苦朴素，有时把苞萝掺在饭里吃，有时吃番薯焖糯米饭。一九六九年冬，山下村遭受大火灾，邦彦在困难中汇济山下灾民人民币一百元，并在附言中写道：“我相信在党支部领导下，你们能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一九七八年，邦彦身患癌症。病中他仍然期望着“病除体健又驰驱”。不幸于十二月四日病逝于上海医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邦彦同志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恢复了级别待遇，恢复了名誉，组织上还给遗属发放了抚恤金。邮电

都发了唁电，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八宝山开了追悼邦彦的大会，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本文根据吴邦彦同志遗稿和吴邦宪、吴瑞安、宋方、浦汉英、郑伯克、郭佩珊、季焕麟、汪光之、吴润珠、缪文兴、徐汉涛、邱关瑾、吴瑞申、叶光明、祝凌云、吴瑞昆、吕福田、吴集璠、吴邦和等同志以及昆明市委党史办来函来稿整理，姓名按函件先后排列。）

踏 莎 行

蒋 仁

〔小引〕适逢腊梅盛开，普降瑞雪。五十四位各界老人，欢聚一堂，研讨撰写我县文史资料，精神可嘉，特填词一首，以表敬意。

柘水晶莹，霞关瑞雪，腊梅花放迎春节。群贤集会畅交流，精心撰史豪情悦。

资料求真，兰章贵切，所闻所见堪详述。振兴南浦建文明，诸君谱写千秋业。

怀念吴邦彦同志

徐 汉 涛

1935年到1938年，我和邦彦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全部历史了解得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因为，启发引导我接近进步的就是他。

在刘行收讯台（1935——1936年）

1934年底我考入上海三报无线电校，学习半年后，1935年秋考入国际电台，在外滩中央室报房实习二个月后，被派到沪郊刘行收讯台当调音报务员。在这里我认识了邦彦同志。他资格较老，是个工薪较多的二等报务员。

收讯台要避开一切干扰，刘行这个地区特别僻静。在高耸入云的巨大铁塔下，一大片土地用铁丝网围起来。台中没有球场，也没图书室，报务员工作、睡觉之余，有的下下棋，有的翻翻《论语》、《西风》等幽默书刊。我们几个青年开始感到生活的单调、枯燥。与上海比起来，这里是一片

寂静，爱好活动的人到这里来是会闷出病来的。

听说邦彦那里有很多书，人们说他学识广博，看问题有独特的见解，我们四个青年一起去他房间拜访他了。邦彦在刘行镇上租了房子，把家眷安置在那里。他平时在单人宿舍住，和报务员张惠之同住一室。张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早晚和三餐饭前都要跪在床前祷告十分钟，平时则伏案恭读《圣经》。邦彦的一边，有着一个摆满书籍的书架，真象一个小图书馆，他总是在桌前看书、或写东西。他告诉我们，每天他要写一页日记，已经写了十年，一天都没有间断。从此，我们经常从他那里借书看。我除了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永生》等刊物外，还借阅了《阿Q正传》、《茅盾小说选》、巴金的《海底梦》、戈公正的《庶联印象记》（庶联即苏联）等等。有一天，他到我室中，见到我桌上放着四、五本一位牙科老医师送给我的佛教经书，他笑着说：“你看的书范围真广啊！”

一九三六年春天，生活书店登征文广告，要求应征者把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事，写成文章，寄交文学家茅盾为首的编委会，由编委会选出优秀文章编成《中国的一日》向全国发行。该年秋，《中国的一日》出版了，其中有一篇《报务员在中国》署名“春光”的，就是邦

彦写的，他以收讯台一个报务员的工作、生活为内容，描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电信事业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畸形病态，以及报务员经受的疾病折磨、工资克扣，迫要房租等苦难生活。大家看了，一致赞好，说是邦彦把个刘行收讯台写活了！文章中虽然没提自己的名字，但都认为这里面有自己的一份。我对他更加钦佩了。我最羡慕的是，为什么他有这样深刻的洞察能力，我最信服的是，他十年如一日地每天坚持记日记的坚强毅力。我暗暗地也开始学着他天天记日记了。

在上海马斯南路收讯台（1936——1937年）

1936年底，日寇侵华野心日益凶狠，国民党当局从刘行收讯台撤出部分收讯机，安装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123号作为分台。邦彦和我都调此台工作。我们的关系也更接近了。他介绍我经常去上海青年会借书看、听讲演，我们还一起看过进步话剧《赛金花》、《日出》等。这时，刘行台的一位老报务员沈俊甸病死了。沈是三十多岁的人，看来已象五十上下的老人，他资格很老，与方砚农等是同学。方等已是一等报务员了，而沈还是三等报务员。他生活朴素，头戴毡帽，戴老式近视眼镜，着长衫，穿布鞋，因患有多年的肺结核病，骨瘦如柴。他成天忧闷不乐，据说由于他长得土

里土气，在外滩中央室上班，“有失观瞻”，才把他调到刘行来的。他省吃俭用，积了些钱，被另一个同学，国内无线总台报务长李桐因赌钱借去，久欠不还。为此，他常大发牢骚。老沈的死，使我感到当报务员的悲惨命运。乃写了一篇文章，运用《日出》话剧中交际花陈白露的一句话作了题目：“太阳不是我们的，老沈永睡了”。经过邦彦的修改，由他寄给《国际电讯》（国际电台群众性的刊物），后来登了出来。鉴于我对老沈的死，思想过于悲观，邦彦借给我看《新哲学人生观》，在书的扉页上他还写了几行字：“……谨将此书介绍给在苦闷悲观中的亲友，……希望我们纠正自己的错误，建立起积极的、乐观的基本认识……”。我对过早辍学有消极思想，他鼓励我说：求学不一定在学校中，努力自修效果是一样的。

一天，他单独对我说，要我帮他誊抄一点东西，条件是：只能我知道，不让别人看。我答应了。一共抄了十二篇文章，除《报务员在中国》外，大都是他在《点划》这个刊物上写的。记得有：《论思想与生活的矛盾》、《再论思想与生活的矛盾》，还有一篇名《调列散记》，说他调刘行工作是被迫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不畏高压，决不悲观的意思。后来他解释说，“点划”是电讯的基本符号，它体现这是报务

员的刊物。这个刊物是秘密发行的，后来上边查得紧了，就停刊了。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方砚农是怎样当上国际台的报务长的吗？原来的国际电台报务长是李桐，国内总台的报务长是方砚农。一次，报务员们发动怠工，李桐束手无策，方砚农则采用找报务员个别谈话，软硬兼施，当面签字的手法，分化和破坏了怠工运动。这样，方砚农大受上级赏识，当局就把两个人作了对调。接着，方砚农就进一步采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邦彦当时是个积极分子，为限制他在广大群众中的活动，方砚农就把他打入了“冷宫”——刘行。我听后如梦初醒，静静的刘行，竟蕴藏着如此复杂的斗争！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发表了《西安事变半月记》，吹嘘自己如何“伟大”，我感到怀疑。邦彦则介绍我看范长江写的《塞上行》。看了以后，我了解了真相，并第一次知道了所谓“匪区”实际是最革命的地方。在他引导下，我还读了《大众哲学》等书。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书给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好象井底蛙跳出了井圈”，“我现在才知道：世界竟有这样的大，天下事竟有这样的复杂！”

在他引导和修改下，我又写了一篇《谈谈中美无线通话奖金和俱乐部》寄给《国际电讯》，内容是交通部发中美通话奖金，报务员劳而无功，没有拿到一文钱。要消除这种不合

理现象，只有组织报务员俱乐部，齐心合力斗争才有出路。

抗战开始，“八·一三”事变后，邦彦叫我出面成立“书报室”，由大家凑钱，购阅抗战书报。我自己也写信鼓励在无锡的未婚妻参加当地的救护伤兵的工作。接着，刘行台被炸，员工全部报到马斯南路，邦彦又叫我发起，在一个晚上开个座谈会，谈谈对战事的看法。我照做了，他也亲自参加，大家踊跃发言。刘华表示：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报献支援抗战。座谈会后，在全台造成了一个“坚决抗战光荣，留在上海当汉奸可耻”的强大舆论。后来，收讯台的绝大多数员工都离开了“孤岛”，到内地参加抗战去了。

在武汉时期（1938年）

1938年1月，我和罗煜襄、刘华三人先到汉口报到。2月，邦彦也来了。我在国际报房工作，他在武昌收讯台工作。他对我说，上海国际台最后撤退时，当局照顾员工生活不够，他和大家与当局说理，改善了待遇。

当时，地下党员卢文懋发动组织了“武汉电信界抗敌服务团”，我和邦彦都参加了。吴在武昌主要负责主编《电信界》，这个刊物是报务员邱关瑾在南京时办起的。由吴主编以后，内容丰富、活泼，深受全国电信同仁好评。我当时是